



制度之外的权力半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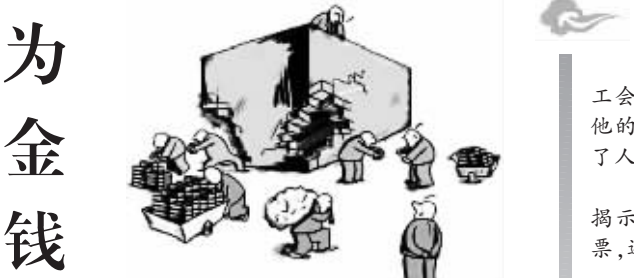
说起李莲英,都知道他是西太后最得宠的太监。批评西太后的人,往往拿李莲英说事,说她宠信太监,祸乱朝廷。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大监干政的罪名,一般都会落到李莲英头上。但是西太后却一直感到很冤,连声说,她没有宠信过宦官,李莲英从来就没有对政事插过一句嘴,凭什么说人家干政?

要说也对,的确,你还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说李莲英对任何一件政务发表过意见。况且此人为人也相当低调,虽说有太后的宠信,但为人处世,能让人则让人,能帮人则帮人。有宫女评价他说,很像一种梨子,长得不好看,但吃起来很甜。甲午前老佛爷派他陪醇亲王到天津阅阅海军,外面的臣子们,听说他来了,都想借机拍拍马屁,可他一个外臣不见,躲在屋子里面,任凭人家怎么劝都不出来。

其实,就算李莲英人品非常之好,低调不弄权,但只要他人在西太后身边,而且还能得到太后的宠信,对于下面的人而言,他就非常有用,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朝堂之上,无论皇帝还是太后,很少能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但是回到宫里,安歇休息之时,未免放松,就算很有城府,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情绪,对某人、某事的真实看法。竟相结交李莲英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情报”。

当然,李莲英的作用和他在权力圈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据张荫桓讲,当年他出使英国,回来的时候,给两宫太后各备了一份礼物,超大个的宝石两颗。一为祖母绿,一为红霞

为金钱而疯狂的人



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把人变成经济动物。它的制度按金钱至上的原则而设计,它的舆论把金钱第一的观念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深处。应该说,金钱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也很容易让人接受“没钱万万不能”的伪真理。在这种制度和舆论下,人们把追逐金钱当成天经地义的首要任务,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向追逐金钱的独木桥蜂拥而去。于是,对于这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人活于世的评价标准变得极为单一:有钱,没钱;钱多,钱少。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这个问题还有特殊性。当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祖上有钱的中国人并不多,到今天,人们也只数到“富二代”。因此,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中国比哪里都拥挤,起跑线上饥饿的人群太多。

金钱成为一切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做事不为金钱,在这样的社会简直就是疯子。但我不知道可疑的“一亿”精神病患者中,这样的疯子有多少,更多的应该是为金钱而疯狂的人,或者是被金钱逼疯的人。金钱就是“现代人”这种动物的食物,还永远处于匮乏之中。在金钱的饥饿中,金钱社会的奴隶们抛弃了一切,为了金钱、为了活命而疯狂。南宋有个名叫陈亮的人曾经说:“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所谓之“五贼”是什么?陈亮说:“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

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让陈亮的思想变成主流,即便生意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仁义礼智信”是长久发财的必然之道,抛弃“仁义礼智信”而发财,只是对财财富凶极恶的抢劫,必定不能长久。当今社会,我们的快乐应该像自然界一样需要多样性,不能把金钱变成快乐唯一的内涵。而这个心愿是金钱社会不需要的。金钱社会以自由的名义,把金钱当成赛狗场的诱饵,每个参与者都为之疯狂。甚至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只引诱赛狗狂奔的电动兔子是假的,不能吃。

为金钱而疯狂,是金钱社会最乐意看到的结果。(摘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英国的傻瓜式智慧

瑞士盛产最精确的时间——钟表,但时间的中心却在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村;巴西、德国屡获足球冠军,但足球最初的规则却产生于英国;最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日本、德国,但计算财富的会计行业,最权威的证书却属于英国。古人云:不立规矩,无以成方圆,英国人善于做规矩。规矩能够实行,必须简单。英国的户外垃圾箱总是并列三个,箱体外没有文字说明,只有图案标识:一个是玻璃瓶,一个纸袋,一个屑屑粒粒的点,摒弃者一目了然,知道归类抛掷,哪怕不识字的,都会各得其所。在上海,垃圾箱上写着“有机”“无机”的化学名词,表示出科技含量。一个垃圾箱,何必那么学术化呢,老人、小孩自然不知所云,外来农民工也无所知所措,像我这样也算读过些书的“知道分子”,尤其量“识其字、不知其义”,只能像下注彩票似地抛掷垃圾,这样标识的垃圾桶,应该放在化学系、科技馆门口。

在英国,哪怕伦敦,大多数道路都能泊车,哪怕单行道、哪怕窄路,但收费泊车位的道旁,都有收费器,没有收费人。车主交完费后,收费器会吐出凭证,你将凭证贴在车窗前,巡检者半小时一趟,远远一瞄,就知道谁没有交费,效率极高,难度极低。

英国的出租车有两类,一类是 mini,只能电话预约,一类是 taxi,可以在马路上扬招停车载客的。mini 车的款式各异,属于私家车揽客,该车必须申请,专管部门批准,交一笔税费,然后在车窗前贴有统一标识,只限于电话预约,不得路途半道上揽客载客。

出租车公司管理,不管哪个公司的车,款式统一:黑色、方头、枕头面似的,上海人所谓的老爷车。如果非此款式的车停在路边载客,任何人都会发现,任何人都举报。众目睽睽,违规者无藏身之地。

为了降低监管成本,首先简单化,直至傻瓜化,这就是英国人的管理思路。一百年前在上海英租界里,黄包车是公共车,漆以黄色,可以路上停车拉客。私家车车漆以黑色,路上载客、接客属于违规,巡捕抓你,上海话“黑车”就出典于此。规则越简单,执行越容易,监督越便利,监督成本越低,违规难度就越高。

规则不是做给内行看的,而是做给外行看的,让社会的相关者都能一目了然,哪怕有些弱智,这是智慧。

让傻瓜也能操作的傻瓜式,是聪明人的杰作。傻瓜就是愚蠢,但傻瓜式却是智慧,英国的管理就是傻瓜式,便于全民执行、监督,这就是这个老牌国家的高妙。(摘自《廉政瞭望》第 10 期 李大伟/文)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工会上再次谈到,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也就是说,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键是要具备可操作性,要提供实践机会,创造条件提高人们对民主的“操作能力”。

发生在深圳的这一次成功的工会直选证明,民主与素质无关,相反还是提升民众素质的必由之路,只要将民主从宏大的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民主实践就会更好地促进“民众的觉醒”,让更多人具备现代公民品格。

不久前,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进行工会改选、直选工会主席。结果,来自一线的生产部科长当选主席,而他的顶头上司、前任工会主席则在第一轮即出局。这一事件持续引发了人们关于民主实践的思考。

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一本名叫《可操作的民主》的书,揭示了两个关于民主的谬误。一是“民主就是投票”。民主不仅仅是投票,还应该是真实的投票,要有相应的议事规则。二是“素质太低不能搞民主”。人们有追求民主的真诚,但缺少民主的“操作能力”,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机会问题,一旦有机会让他们去学习怎么操作民主,他们就拥有了“可操作的民主”,而不是“可操纵的民主”。

事实上,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的工会直选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呼应。两个月前,这家公司曾因员工对公司的工资制度和福利待遇不满而发生停工事件,员工提出改选工会的诉求,希望选出一个真正代表自己的工会组织。在选举现场,媒体记者看到,由员工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候选人基本上是普通员工,在竞选演讲过程中,他们有的打出“真诚牌”,有的晒出往年工作“成绩单”,有的则亮出当选后的“规划图”……投票后,计票员在计票板上划“正”字,当场宣布结果。每人一票“挑”工会主席,让该公司员工经历了第一次真实的民主历练。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工会上再次谈到,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也就是说,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键是要具备可操作性,要提供实践机会,创造条件提高人们对民主的“操作能力”。发生在深圳的这一次成功的工会直选证明,民主与素质无关,相反还是提升民众素质的必由之路,只要将民主从宏大的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民主实践就会更好地促进“民众的觉醒”,让更多人具备现代公民品格。(摘自《晶报》6.11)

在海南致力于打造“国际旅游岛”的背景下,三亚宰人事件成为龙年春节期间一场热闹非凡的大戏。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关失败案例,暴露了三亚官方面对危机的种种失策之举。其最受诟病之处,莫过于声称追究恶意攻击者的责任,以及请赛报者站出来“维文”。

这是一种典型的“敌对思维”,它长期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文革”期间曾达到顶峰。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于,把善意提醒或者批评者设想为自己的敌人,看做自己的对立面,将正常的建议、批评或者举报视为恶意攻击,理解为给自己抹黑。

这种思维方式既可能发生在平民百姓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政府(或者官员)与民众之间。倘若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结果往往是在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甚至互相陷害。“文革”期间类似的情形,包括亲人反目比比皆是。

小厨师勇批大部长

1980 年,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在北京一家名叫“丰泽园”的高级饭店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面对这样一位“职权权大的‘特殊宾客’”,丰泽园饭店当时 20 多岁的全国劳模、厨师陈爱武是这么办的:他先找饭店党支部的几个委员谈,又到市服务局“上访”,但都不管用。最后,他写了一封检举信,直接寄到中纪委。

不久,中纪委查实情况,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

原本这事的“内部”解决,但是,《中国青年报》却于 1980 年 10 月 16 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

“这是建国以来报纸公开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官员。”采写这一报道的记者马北北后来回忆说,“一时间,舆论炸开了锅。”

当时,马北北只有 25 岁,刚刚进入报社。初获这一线索后,她立刻向编辑部汇报。时任副总编辑的钟沛璋(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经过慎重权衡,决定展开调查。“最多就是把副总编的职务撤了嘛。”钟沛璋事隔多年后回忆说。

那是一个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生活节俭故事津津乐道的年代,而一个部长竟然在饭店“吃乌鱼蛋汤这样的高级饭菜”。那时,“腐败”一词还不流行,人们斥之以“搞特权”。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钟沛璋说。编辑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军费减少,不足部分需自筹解决。于是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部队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十分高涨。这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江泽民主持军委工作后,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重申了这一符合军队社会职能的思想。但由于整体军费满足不了需求,军队生产经营的规模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据 1993 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万个,从业人员 80 余万。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对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早就深有感触。

早在张震上将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期间,一次,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还有一次,地方因经营纠纷,有关人员状告国防大学,身为上将的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当然就成了“被告”。所有这些都使张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

1993 年 10 月 30 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决定》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决定》提出实行军企分开,生产经营单列体系,使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

同年 11 月 3 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张震代表军委讲话。他提高声音强调说:“从历史教训看,军队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张震还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九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如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为一己私利,竟事先告诉其经纪人,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还蒙在鼓内,事后他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这件事,张震后来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及。张震强调指出:“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摘自《潮潮》凌辉/文)

“敌对思维”,无论对于个人关系,还是对于社会关系都害莫大焉。从根本上讲,政府是民众为了自由和平地共处而设立的组织,其唯一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非追求自己的利益。政府没有也不应该有独立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它所应做的一切都应是保护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摘自《学习时报》6.18 王建勋/文)

1980 年中青报点名批评部长事件始末

部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两人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10 月 14 日,中纪委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 日,《中国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将报道刊出(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 日不出刊)。

报道中披露:王磊仅自 1977 年以来,到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 16 次;以那一年他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 124.92 元,而他只付了 19.52 元。这一天,报纸同时配发了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社论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篇通讯一出,全国舆论的焦点一致对准了特权。清晨,王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这则报道和社论,当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这位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当天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

见报第二天,其他一些“特殊宾客”也当即闻风而动。粮食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下,马上把钱送去。”北京市外办一位干部,也打电话到丰泽园饭庄表示“将立即把钱补足”。

接下来,《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进行了连续而密集的报道。半个多月时间里,围绕陈爱武批评部长事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军费减少,不足部分需自筹解决。于是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部队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十分高涨。这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江泽民主持军委工作后,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重申了这一符合军队社会职能的思想。但由于整体军费满足不了需求,军队生产经营的规模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据 1993 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万个,从业人员 80 余万。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对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早就深有感触。

早在张震上将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期间,一次,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还有一次,地方因经营纠纷,有关人员状告国防大学,身为上将的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当然就成了“被告”。所有这些都使张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

1993 年 10 月 30 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决定》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决定》提出实行军企分开,生产经营单列体系,使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

同年 11 月 3 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张震代表军委讲话。他提高声音强调说:“从历史教训看,军队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张震还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九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如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为一己私利,竟事先告诉其经纪人,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还蒙在鼓内,事后他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这件事,张震后来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及。张震强调指出:“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摘自《潮潮》凌辉/文)

部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两人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10 月 14 日,中纪委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 日,《中国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将报道刊出(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 日不出刊)。

报道中披露:王磊仅自 1977 年以来,到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 16 次;以那一年他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 124.92 元,而他只付了 19.52 元。这一天,报纸同时配发了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社论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篇通讯一出,全国舆论的焦点一致对准了特权。清晨,王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这则报道和社论,当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这位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当天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

见报第二天,其他一些“特殊宾客”也当即闻风而动。粮食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下,马上把钱送去。”北京市外办一位干部,也打电话到丰泽园饭庄表示“将立即把钱补足”。

接下来,《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进行了连续而密集的报道。半个多月时间里,围绕陈爱武批评部长事件,

媒体遭遇压力 副总编据理力争

《中国青年报》点名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的做法也遭遇了高层的压力,引来了强大的质疑声。有几个副总理明确表示不高兴,团中央就此事也对《中国青年报》进行过内部批评。对于这些批评,钟沛璋在 1980 年 10 月 31 日有关部门召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党内讨论会上发表了对于此事的看法。11 月 3 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评论文章,回应质疑。

有人问:“你们这样点名批评,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和来头?”10 月 18 日,这家报纸的社论《党鼓舞我们去改革》作出了回答:“的确是背景,有来头的。这背景就是党中央再三发出的纠正不正之风的指示……来头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这段摘自同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话,在此期间,被特意突出地印在其中一期报纸的版面上。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的署名评论员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文中这样写道。

这篇报道为《中国青年报》带来了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据钟沛璋回忆说,当他 1982 年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 300 万份。

(摘自《中国青年报》包丽敏/文)

片断

●1887 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政府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 100 万两白银。对于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效?”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史铁生特别喜欢开玩笑,即使是面临绝境,也不忘调侃一下。他生前每年遛新要花费 25 万,由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拨款。除此之外其他巨额的医药、治疗等开销,只能靠史铁生纯文学创作的微薄收益来负担。面对来访的老友李锐,他曾以看透生死的心态调侃自己的经济处境:“老天爷先是我坐下,现在又让我躺下,你别瞎嚷躺下了,咱现在可是高级人了,别人请一桌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就得花五百多块。”(综合《文史参考》2011 年第 3 期、第 5 期)

冷战期间的反美民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最流行的是反美民谣。那时只要你走在大街上,时不时都会传来孩子有节奏的民谣声: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床上吃床上拉。

杜鲁门是什么人,孩子们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是侵略朝鲜的美国总统。听这名,杜鲁门,大便随便的能不是个大坏蛋。美帝都是大坏蛋。

1960 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就有了“肯尼

孙中山的国籍之谜

1882 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 年,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他通过在夏威夷的亲友作证,弄来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 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称自己是 1870 年 11 月 4 日在夏威夷出生,并以此为理

由取得了美国国籍。不过,他的美国护照却在入关时遇到了大麻烦。据旧金山洪门大佬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1904 年 3 月,当孙中山乘坐的“高丽”号轮船到达旧金山时,海关人员以孙中山的美国护照有问题为由将其扣押,准备将其由原船押回。

在黄三德等人的积极营救下,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 17 天的审判,最终获得胜诉。1904 年 4 月 28 日,美国政府工商部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居留。

但是,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8 年,孙中山在泰国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向美国驻暹罗公使馆寻求保护。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1909 年 3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回复说,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

可以肯定的是,在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并非外界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

(摘自《广州日报》2011.9.15 徐晴、刘旦/文)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

那疑